

张云涛 著

潭柘寺碑記

愛新覺羅毓嶠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阅 览

张云涛 著

潭柘寺碑记



爱新觉罗毓峯题



中国文史出版社

K877.42
2012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潭柘寺碑记/张云涛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034-2503-5

I. 潭… II. 张… III. ①佛教—寺庙—史料—门头沟区 ②佛教—寺庙—碑文—汇编—门头沟区 IV. B947.213 K877.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7839 号

责任编辑: 陈连琦 刘 夏
封面设计: 冯 静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录 排: 北京天放禾城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33 字数: 7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2.00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潭柘寺碑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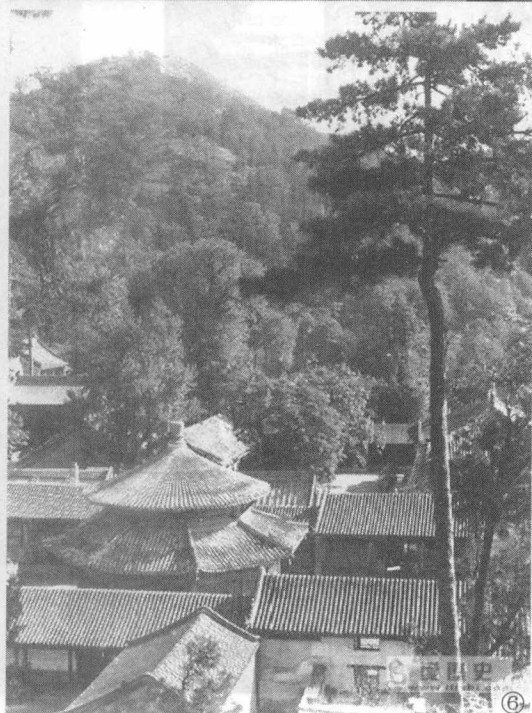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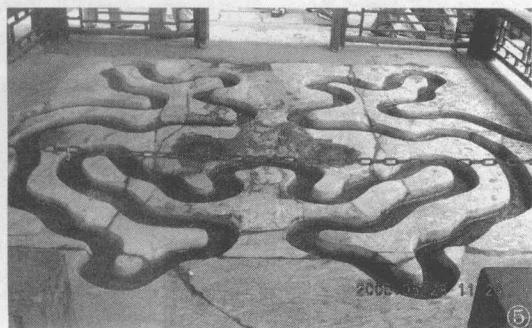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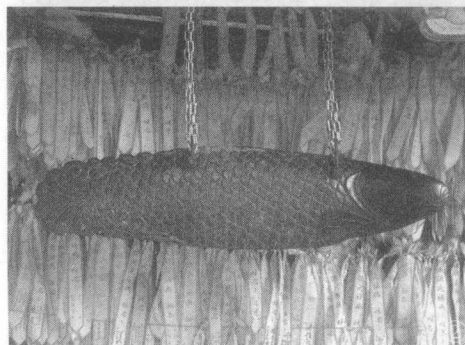
潭柘因万缘之慧力 碑记藉众手而成文 感谢为此书做出贡献
的名贤善友 爰新觉罗毓蟾 丽水夫妇 李永青 赵云田 于良
刘德泉 佟洵 常华 张文大 倪平 郭彦利 郑士德 赵永高
李爱民 张广林 师昌璞 易克中 张大可 黄耀华等
感谢给予此书支持和帮助的各界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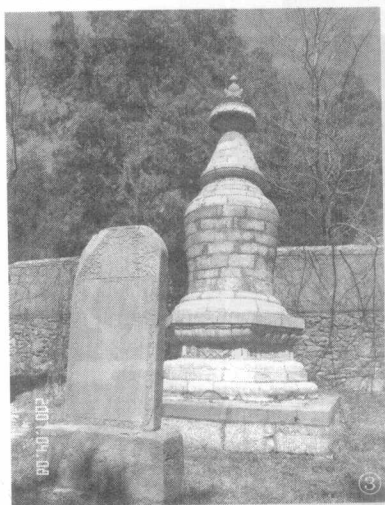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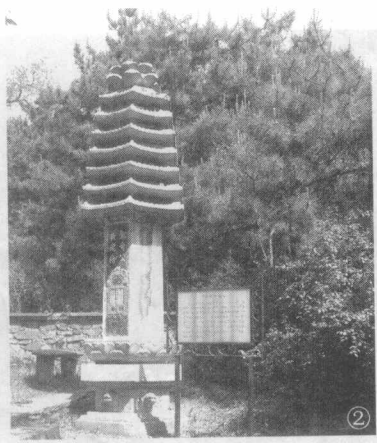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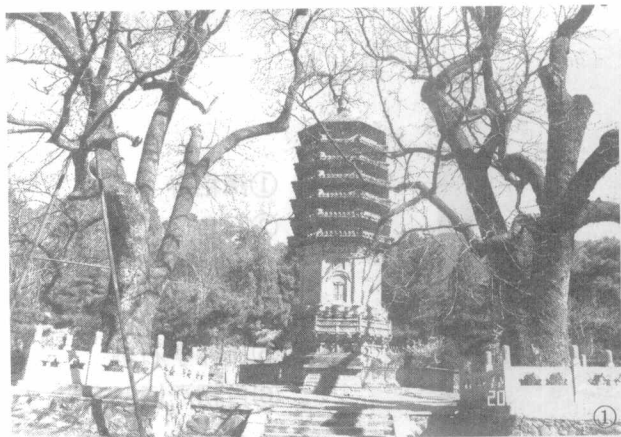
张云涛

公元二零零九年立冬



- ①潭柘寺
- ②石鱼
- ③老虎洞
- ④碑林
- ⑤流杯亭石刻
- ⑥古楞严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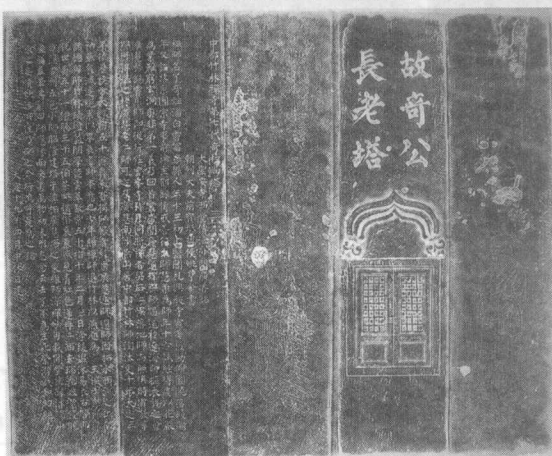


- ①(金)密檐式塔
- ②(金)经幢式塔
- ③(明)覆钵式塔
- ④(清)覆钵式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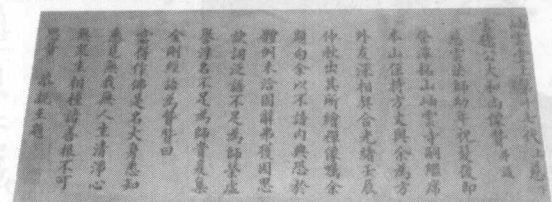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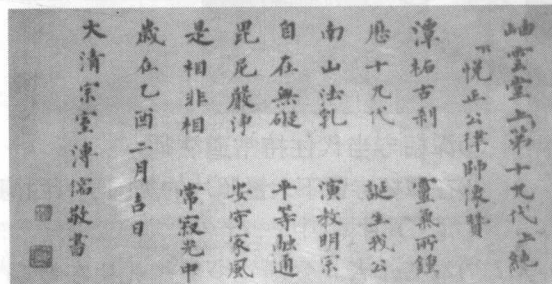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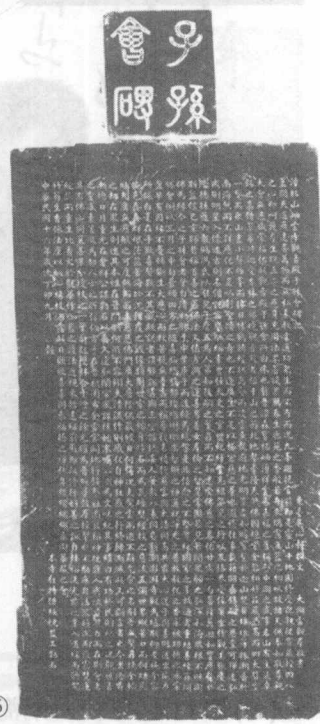
- ①乾隆皇帝御笔
- ②金人墨迹
- ③恭亲王奕訢墨宝
- ④诗书画大师溥儒墨宝
- ⑤子孙会碑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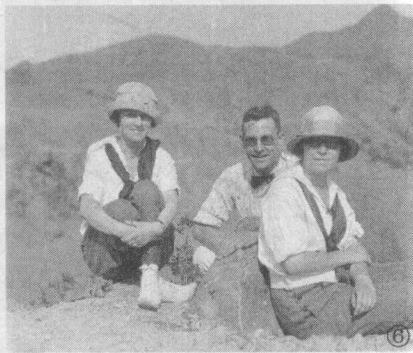
③



④



⑤



①康熙皇帝

②乾隆皇帝

③恭亲王奕訢

④(清)第 11 代住持月朗海亮大师

⑤潭柘寺当代住持常道法师

⑥在潭柘寺留下大量照片的美国学者西德尼·D·甘博(中)一行

⑦本书作者与爱新觉罗毓嶙先生在一起

序 一

爱新觉罗毓嶠

戊子年夏初，北京戒台禅寺重修竣工，特举行开光盛典，住持妙有法师一仍传统立碑纪盛，偕碑文作者张云涛先生驱车寒舍邀予书丹。旧府与戒台寺素有渊源，清末民初，四代家人居此二十多年，寺中碑群尚有先曾祖恭忠亲王奕訢所立两统（光绪十七年1891），距今百有余年，经风雨侵蚀，而拓者甚少，笔画不减当年。惜先父溥伟所记方丈室碑不知去向。

今予书丹，再续祖先因缘，实生年之幸，曷胜铭盛。与张先生相识于丁亥春天，适逢其大著《北京戒台寺石刻》书出版，该书将戒台寺自辽以来七十余统碑文，引经据典，考证著成“石刻”之历史，文熟于心，创先河之举也。书中专节“恭亲王家族与戒台寺”，作为后人，每捧读则不禁动情。先祖当年避慈禧之焰，远离庙堂，作为闲散亲王筑牡丹小院于寺中，自题曰“慧聚堂”。又捐资修千佛阁、罗汉堂，并赎回庄园一处，因立碑传之后世。

古人云“事非经过不知难”，此决非虚语也。吾有一册《明清楹联集》欲加注释。联中典故堆砌，难觅出处，知难而却矣。而张先生一非教授学者，二非专业，全凭对家乡和父母之真情爱戴，自学成才，令人钦佩之至。

今张先生又送来《潭柘寺碑记》打印稿。原来，在《戒》书出版后，即着手起草，步骤先是拓下潭柘寺所有之碑，然后抄录、核对、断句、标点、注释，重点文章译为白话。有关人物、事件、佛教专门知识等等都详细解释，使人人都能读懂，学者有据可查，常

人有趣可赏。潭柘寺历史悠久，俗话说“先有潭柘，后有幽州，”北京之古称，故通过碑文亦可以反映出各朝代，如辽金元明清的佛教政策，其与当时佛教的兴衰有直接关联。碑刻经张先生研究比较，发现许多清代碑刻是明代原碑改刻成的，因明代石碑都比较宽大厚实，磨平之后可以重刻。

清康熙朝崇尚孔孟儒学，吸收汉文化，而对佛教有所警惕，引南北朝梁武帝迷佛误国为戒，严格限定寺庙规模和出家僧道人数，不过对潭柘寺却非常例外，情有独钟。缘于清代皇帝对该寺的宠信，到清末逐渐发展成为庞大地主庄园。该书通过历代碑刻看到它的发展历史，亦可根据碑刻考据出“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历史年代。佛教寺院全供奉释迦牟尼佛，但教派不同，其修行方式略有不同。潭柘寺以华严开山立宗，华严鼻祖法藏大师，曾受武则天赐贤首之名，亦称贤首宗。该书堪称一部潭柘寺志书。

承蒙张先生送来首稿，使吾先睹为快，余才疏学浅，历史和佛教知识很有限，通过注释和今译，开阔眼界，增长不少知识，该书较之戒台寺石刻又深入一步，特别对历史渊源、寺庙建设与庙产、历代高僧与传奇、历史人物与趣闻轶事、民间香会、塔院等等，都有很深的发现与研究。

余之先曾祖及家族与西山潭戒二寺素有情缘，张先生邀予作序，实勉为其难，既然先睹了就把初读心得写给读者，用塞张先生命我作序之责。

余罹目疾，眇一目十有余载，小楷遂废，因不能见笔锋及纸也未。今张先生固邀予以小楷为序，春蚓秋蛇在所不顾，予弗获辞。遂冒酷暑力疾书此。赘数语者，非敢为华众也，幸得见谅于诸大方之家。己丑年初伏。

时年八十又六。

序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赵云田

云涛先生的《潭柘寺碑记》杀青了，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他用了几年的时间，不分寒暑，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奔波忙碌，寻石碑，拓拓片；不分昼夜，在茫茫的书海中查阅古籍，核实资料。这种既进行田野考察，又进行文献研究，把田野考察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的严谨学风，值得称赞，令人敬佩。当然，他所付出的辛劳也可想而知。多年辛苦不寻常，一部沉甸甸的著作即将问世，同时也给了人们许多生活上的启迪。

《潭柘寺碑记》一书在内容上分为三部分：一是从碑记所反映出的潭柘寺的历史。内容包括潭柘寺的兴建和发展历程，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教派传承和历代高僧，相关的诗文和作者介绍，与潭柘寺有关的社会组织活动情况，历代统治者和潭柘寺的关系等等。二是潭柘寺历代碑记选编。除了介绍每块碑刻形成的历史年代及其方位、石质的特点外，还对碑文进行了断句标点，详加注释，甚至于译成现代语言，从而有助于读者对碑文的理解。三是附录及征引书目。对书中没有收录的以及佚失的碑刻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注明形成的年代，哪些文献中有记载等等，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

看完全部书稿，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本书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填补了我国碑刻文化的一项空白。众所周知，碑刻就是含有文字内容的石刻，它是我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记录，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碑刻作为一种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集历史、文学、书法、镌刻于一体，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同时，碑刻又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对有关碑刻进行整理研究，向来是我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许多地方、行业、群体甚至个人都有碑刻存世。多年来，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经过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的努力，碑刻的整理和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从地方上说，徽州碑刻、苏州碑刻、无锡碑刻、镇江焦山碑刻、雁荡山摩崖碑刻，已经有人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从朝代上说，秦汉碑刻，也有人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从人物上说，徐霞客碑刻的整理和研究成绩比较突出；从行业上说，北京的建筑碑刻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尽管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碑刻分布的地域广，数量多，有些地方的碑刻还没有人触及，比如，作为北京郊区最大的一座寺庙古建筑群的潭柘寺碑刻，就还没有人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云涛先生在出版了《北京戒台寺石刻》一书之后，又完成了《潭柘寺碑记》一书的研究和撰写，这不仅扩大了北京地区碑刻文化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填补了潭柘寺碑刻研究的空白，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北京戒台寺石刻》和《潭柘寺碑记》两书的编撰看作一个系统工程的话，也可以说，正是这两部书，填补了北京地区寺庙碑刻文化研究的空白。

以上是从大的方面概括地讲本书的学术意义。其实，本书学术上的贡献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它拓宽了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建筑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众所周知，潭柘寺历史悠久，殿宇巍峨，佛塔林立，古木参天，名僧济济，与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一度成为皇家寺院，在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本书中选编的80余篇碑记，不但反映了潭柘寺的一些基本情况，而且涉及到非常广泛的社会内容。从潭柘寺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教派传承和历代高僧的情况，人们对中国北方佛教的特

点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和潭柘寺有关系的各种社会群体地域的分布及其活动，以及潭柘寺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很大的地主庄园，人们对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形态有了更新的了解；从历代统治者和潭柘寺的关系，尤其是潭柘寺一度成为皇家寺院，人们加深了对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宗教政策的认识；从历代对潭柘寺的修建和维护，以及潭柘寺的整体布局，人们对传统的建筑学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从和潭柘寺有关的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大到最高统治者，小到香会的首领，人们加深了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怎样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人们会进一步思考。甚至在伦理学方面，本书所选择的一些资料对人们亦有启发。例如震寰照福大和尚的《戒学颂》，不就是可以启发人们在滚滚红尘中，应当“莫妄行”，“要实诚”，“能包容”，“要和平”吗？

本书在学术上还有一些具体的贡献，这就是经过作者的详细考证，纠正了许多书中的误解以及民间的一些误传。例如潭柘寺始建于西晋，就是本书作者经过考证得出的正确结论。又如道源和尚，有人说他是印度人，而本书作者经过考证，明确了道源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如此等等，不再赘述。

记得今年在一次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生答辩会上，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一级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先生曾说：博士论文既是给专家看的，也是给普通读者看的；专家看了可以提出意见，普通读者看了可以明白许多问题和道理。我非常同意李先生的话，就是说博士论文应当让一般读者也能看得懂，并在这里借用李先生的话说：《潭柘寺碑记》一书既是给专家看的，也是给普通读者看的。专家看了可以开拓思维，提出意见，进一步促进学术的发展；普通读者看了可以明白许多问题和道理。这也正是《潭柘寺碑记》一书的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特点。我还可以进一步说：由于作者在撰写本书时就已经考虑到了一般读者的阅读，对碑文进行了断

句标点，详加注释，并译成现代语言，所以，《潭柘寺碑记》一书就是为广大读者写的。

在这里，我还要为本书作者说几句话。云涛先生本不是进行学术研究的，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对家乡无比热爱的感情，在时代提供的大好条件下，把握机遇，终于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先后完成了《北京戒台寺石刻》和《潭柘寺碑记》两部力作。他的成功，再一次印证了一个真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最后，还要说明一个情况。在少年时代，通过《济公传》，我了解了西湖灵隐寺，初步接触了佛教寺庙和僧人。中学时，在一本书中，又读到了这样的诗句：“松舍青灯闪闪，云堂钟鼓沉沉”，从中感受到了僧人的生活。在30年前，我曾研究北京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及其管理情况。后来，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佟洵教授进行北京地区宗教文化的系统研究，我阅读过有关书稿，并为其中的一部专著作序。我想，我和佛教及北京地区的宗教有一定的情结。在这种情况下，云涛先生的《潭柘寺碑记》书稿拿给我看时，我非常高兴，并愿意写序，因为我从这部书中也学习和了解到了许多知识。

2009年6月1日

于马甸寓所

自序

张云涛

石碑石刻是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之一。在我国其数量之多，可谓富甲天下；其内容之丰富，可谓包罗万象；其形制之多样，可谓品种繁多。凡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民俗、文学、艺术、科技、建筑等方面，都可以从中找到有益的资料。

2007年我的《北京戒台寺石刻》（以下简称《戒》）出版，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又为什么能做好这本书？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提问，还真无从答起。后来，我认真回想自己的人生道路，不得不回忆起父母对我的教育。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上甜。成绩的取得，还要得益于我的苦出身。我生长在永定河畔一个小山村，自幼吸吮着故乡的营养，家中很穷，父亲是个煤矿工人，一个人上班，养活全家。母亲勤劳而贤惠，主持家务四十余年，最喜劳动。黎明即起，琐屑家事，无不躬亲。在照料我们五个孩子的同时还要打一些零工，如给服装厂、红叶鞋厂等缝衣服（给半成品衣服纤边、锁眼等）、纳鞋帮、粘纸盒、割草等。到矸石山捡煤是全家的副业，爸爸下班要捡煤，妈妈闲时要捡煤，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捡煤。附近的门矿、大峪矿、城子矿、九龙矿、老虎窑（官厅矿）等矿山的矸石山几乎都跑遍了。中小学的闲暇时间，除了捡煤以外，打（荆）条、割草、刨药材，有时甚至还要拾荒，生活的窘境可想而知。以至于后来家中的第六个孩子——小妹妹出生后不久就送给了远在他乡的大姨。幼年的生活虽然贫苦，也使我一度产生自卑，幸运的是我终于没有被自卑击倒，而是由自卑

变得酷爱学习，也磨炼了不向困难低头的意志。幼年的无知，免不了有些自负，而自负又在长期的学习中被克服了。

如今，父母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但是，每当我孤独寂寞时，总会想起他们，是他们给予我生命和无穷力量。在我的生命长河里，他们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每当想起他们的时候，无力的身躯就会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我真的好怀念他们，想他们，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记忆。以前，我真不知他们在离我而去的时候，世界上还会有谁陪着我走完人生之路，只有他们知道我的心，知晓我的情。尽管他们都已经远去，但他们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想让他们与我同在一片蓝天下，同享阳光雨露。这种回忆已让我享用不尽，我真的好幸福，即便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都能勇敢地挺过去，总是以欢乐幸福的容颜面对他们。

多年以来，受父母的谆谆教诲，从未敢忘记他们对我的教养。记得在母亲弥留之际，病友曾指着我问她：“那是谁？”她深情地说：“他是我儿子。”多年生病住院的父亲，每当我外出考察时，总会在病榻上说：“今天我身体没事，你放心地去吧”。平常的一句话，蕴含着多少母（父）子深情，多少希冀与厚望，而做为儿子到底为父母做了些什么？

人要有感恩心、仁爱心、清静心。这是一生的原动力。百花山胜泉岩碑文讲到对待人生要“如月照水过不留痕，如云住山散不留迹”，这便是“报佛之恩，报亲之恩，报师之恩，及普报檀施之恩。”我不是佛子，不必报佛恩。但是，父母之恩，天高地厚；国家之恩，语无包量。亲人、师长、朋友、同事之助，亦应有所报偿。我如何以自己绵薄之力报亲、报国、报众人之恩？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则立言。”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责任。大千世界，千行百业，做好工作是人的本份，而仅仅做好工作，还远远不够，更应该践行父母的期望和对家乡的责任。1999年2月7日母亲去世，带给我人生最大的改变，就像经历

了人间炼狱，刹那间，世界变得黯淡，时间变成短暂，空间变得茫然一片。多么慈祥的母亲，转瞬之间却与我阴阳相隔，有生之年，永不能相见。世界恩赐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竟是那样短暂！我像经历了一场劫难。从此，也重新审视自己，再次规划自己的后半生。

我热衷于工作，从不敢丝毫懈怠。而时间教我明白了《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1987年我有幸参加《当代中国·北京卷·门头沟分册·工业篇·工业发展大事记》撰稿工作。在遍访工业前辈之余，搜集了一些民俗素材，引发了一些兴趣，也隐隐感到一种责任。以后，兴趣越来越浓，开始写一些民俗方面的文章。但是，却从未敢触及名人、大家、领导所写过的领域，而是将有限的业余时间用在乡间勘察、采风，漫步在田野的广阔天地，开发另一块民俗“处女地”。以后，资料越积越多。偶然的机会，经赵永高先生介绍走进民俗协会。从此，涉猎领域也渐渐从乡间“小庙”拓展到名胜古迹。

如果说《戒》的成书缘于一个梦想，《潭柘寺碑记》则是这个梦的延续。小时候梦想写书，却没有想过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当我走过全国许多地方，见到众多的文化现象、文物古迹和石碑石刻，就像徜徉在一块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到处可见的石刻给了我深深的印象。它种类多、年代久、規制繁、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厚，是其他文化载体无法比拟的，简直就是一座文化的宝库，一本人们熟视难解、玄机妙藏、尘封千载的石刻史书。这么好的文化资源，没有被人们认识，没有被历史所传承，没有转化成“生产力”，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因而便产生了将它编译成书的冲动。

如果说《戒》的成书，还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潭柘寺碑记》更多思考的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责任。落笔千斤，弄不好就是历史的罪人。我深深地体会到，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事情还要从一点一滴做